

米中首脳会談後日中関係を軸とした東アジア政治の行方

時殷弘教授を囲んで

【出席者】時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加々美光行（愛知大学教授・司会）、鈴木規夫（愛知大学教授）、浅井正（愛知大学法科大学院院長・教授）、川村範行（名古屋外国語大学特任教授）、顧令儀（ICCS 研究員）
他一般参加者

鈴木規夫：では時間になりましたので、始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今日は暑い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急遽こういう企画を持ちましたのは、加々美先生の発案になるものです。昨年来のこともあり、日本では色々な形に議論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もあります。中国の方でもちょっと微妙な日中関係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れまでの経過とそのほかのことも踏まえて、一度深く議論すべき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は時殷弘先生に急遽ご来日いただきました。最初は加々美先生と政治外交班クロウズドで議論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のですが、せっかくいらっしゃるであれば、もっとすこし開いていて、いろいろな方々にもお話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こういう機会を設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まず、時殷弘先生について簡単にご紹介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1951年3月江蘇省常州市という所でお生まれになりまして、現在は中国人民大学国際関係学院の先生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人民大学にありますアメリカ研究センターの主任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中米関係のご専門ですが、なぜ日本とも関わるかということ、この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においても以前深く取り上げ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中日関係の「新思考」という一連の流れがございまして、その際にも時殷弘先生は色々議論を展開されていて、日本に対する関心も深くなって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でした。しかし、基本はアメリカを中心にし

た国際関係のご専門ですので、その点は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貴重な存在でありまして、ただ単に日中関係の研究者というばかりではなく、国際関係の全体から日中両国の立場をご覧になってらっしゃるので、意見交換にしても、議論を立てるにしても参考になるところがとても多いと考えるのです。ただ単に日中関係の狭い関係ばかりではなく、国際政治の文脈の中で、日本と中国の関係を考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急遽お呼びして、議論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これから、90分ほど時殷弘先生により基調報告を行って頂き、その後少しお休みしてから、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移りたいと存じます。今日はよろしく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時殷弘：非常感谢鈴木教授の开场白。也非常感谢爱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加加美教授对我的邀请。也非常非常感谢在座的所有各位。今天这么热，还赶到这里来，对此我表示非常的尊敬和感谢。

今天我要讲的问题，就是屏幕上的《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前景》。关于这个，我还有一个《兼论较好的半岛政策和中韩关系》，我就不讲了。关于我讲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中日关系其他直接、间接方面，以及关于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空前激烈对抗，我愿意在大家提问、做评论的时候，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讲的内容一共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1. 两类基本两难与八项基本挑战；
2. 用于预测的两大参照；
3.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或根本困难；
4. 关于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5. 如何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6. 另一种可能的中美大国关系；

中国现在有了开场表现杰出和饶有特征的新一代领导，他们掌握与先前多年相比大大增强了的中国国力，但同时处于几乎远不那么有利的和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环境。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中，存在两类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内在紧张或两难，那就是（1）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互相间常见的抵牾或两难，特别是国家军事/经济战略需要 vs. 国家外交战略需要；（2）然而，甚至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是另一类更基本的抵牾和两难，即国家战略需要本身 vs. 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中国尚未形成不仅被拟定出、而且经过较持久实验的对外大战略，以致能够对下列基本问题作出哪怕是粗略的回答。基本问题就是八个如何。如何对待急剧增长了国力和急剧增长了“大众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有关力量？如何对待美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愈益广泛、深刻和显著的军事/战略对立或竞争？目前，中国对前者（军事对立）大致只有在中国国内大力加强和加速军力建设一途，而对后者（战略竞争）仍在多个方面基本乏力，作为短少。与之密切相关，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特别是与它们的愈益突出和尖锐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且一方面能够强有力地推进实现中国的主权存在、合法权益和民族愿望，另一方面使得非常强劲和持续地崛起的巨型中国能在战略和外交领域成为对邻国来说可以接受的？

还有，鉴于中国军事权势投射能力的经久急速建设和中国海外经济存在的极有力扩展，它们的综合效应怎样？因而，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防止或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

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将下列两者较为平衡起来，即中国人民大大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如何应对中国愈益广泛巨大的海外经济存在、经济势力与当地社会和国家的愈益复杂的关系，后者在文化、社会和宗教等基本方面一般是中国人很不熟悉的，如何避免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被迫或被逼的帝国主义”，那开始于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保护天经地义地合法的域外海外自身利益？如何贡献于“全球治理”而不损伤“中国治理”？还有，如何对待“电子通讯世界”、“非政府组织世界（‘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和各种各样的“软实力”问题？

有一个近期甚而中长期的关键问题：如何“着眼大局，管控风险，经略周边”？又如何使新近得到着意应用的“底线思维”下的“近底线操作”不急剧增大风险和令风险突破控制？换言之，如何对待——借用军事类比——“战区作战方式”与更广大的战略/政治目的之间的两难？

现在我们来预测中国对外政策前景。预测就要有参照，有两大用于预测中国对外政策前景的参照，其中一个真正地大，另一个较小，但更有直接的或当下的适切性。

胡锦涛前总书记十八大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反映了对较长期的国家战略需要的战略意识（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睦邻政策），考虑到当前的主要外部政治/战略环境就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报告其他部分包含的“海洋强国”目的宣告、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宣告、继续大力加速业已急剧的军力建设的方向宣告部分地反映了上述国内制约，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外交“再平衡”、日本非法的钓鱼岛“国有化”和南海争端等代表了上述国外刺激。

就中国的对美战略来说，胡锦涛前总书记强调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方略可被认为

是个“软拳头”，用来对付美国的“硬拳头”，特别是其战略“再平衡”和军事优势。这样的方略的意图大概是籍以时日，作为软硬拳头之间这不对称过招的一个结果，美国的硬拳头会被软化。反之，如果中国要运用硬拳头，后果就会是彼此的拳头都变得更硬，导致中美冲突必不可免。然而，问题在于相反的观点，即中国的硬拳头籍以时日能够美国推回去或迫使它软化，如果不严重挑战美国的“底线”，也言之有理，而且现时在中国是个更得民望的思维途径和战略主张。

在较小的参照中间，特别可以注意到中共十八大以后的相关的主要事态，即（1）习近平总书记兼主席屡屡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或用中央正式概括和频繁宣讲的话语说“中国梦”主题；（2）关于军队头号使命和军力发展之直接目的首要军事原则有所变化，从“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为目前较简单但更全面也更有力的“能打仗，能打胜仗”；（3）关于军力跃升的官方报道在十八大前后的几个月里曾空前频繁，不断宣告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突破性成就，宣告武装部队实际战力的重大增进；（4）中国对与个别邻国（特别是日本及菲律宾）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态势更加强硬，迫不得已时不惜武装较量的意向一度近乎显著昭彰；（5）多半由于媒体舆论的作用，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期间和在博鳌论坛上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以前，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那是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强调的。

中国对外政策，总的来说，现在相当强硬。但是仍然是在我讲的基本的两难之中。中国对外政策的势将经久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国家战略需要克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这将是新领导在对美和对周边邻国的政策上面面对的主要挑战。

这挑战已经尖锐，但回应依然准备不足，

且远非整合。

现在我们主要来谈中美之间的关系，预测中美关系的前景。引用习近平主席的概念，就是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分辨其中理应包含的最基本的概念内涵：我们考虑或设想的是何种新型大国关系？它会有多“新”？它能有多大真实的可能性或现实性？还有，如果它要成为很可能的，那么中美双方根本上应当做什么，或采取何种根本立场？

就此，不要忘记寻常经验性的一点：不那么非常新颖的能够是较易追求甚或较易实现的，换言之较为可行的。

与此相关，应当吸取中美双方前几年的一个重要教训——主要由于美方的倡导和反复宣扬而来的教训，即将较抽象甚或浪漫地哲学化的“建立战略互信”当作对待中美关系问题的中心概念，从而至少有损于更多地集中关注尊重对方的具体的紧要利益和紧要关切，更切实地磋商和处理具体的重大歧异和重大抵牾。

在此，应当非常认真地设想如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虽然它与侧重于别种范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相比多少不那么新颖。

这前景就是，在一个根本前提——巨型中国的和平腾升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之下，美国将认真得多地考虑中国不但在经济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甚而战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段内最终采取一种和平的“最终解决”。这将要求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不同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并且采取一种“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优势分配”而非优势垄断理念。

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

它们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海区或洋区拥有对美军事边际优势（以台湾东部海岸外邻近海域为大致的战略“分界线”），并且意味着台海两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统一；这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这就是美国可能给中国的东西，下面我要谈中国能给美国什么。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将保持它在世界的总的军事优势和（特别地说）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美国还将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去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如果邻国也这么做，从而保证美国的两项紧要利益——亚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还将拥有在在某些地理区域的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的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做出的贡献，这在其他之外，意味着中国的贡献必须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这一切将使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密切协商和合作成为必要和必然，也将要求（1）美国接受一个和平和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2）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下面来讲战略问题。为了争取基于“选择性优势”或“优势分配”理念的、中美之间作为两大强国的和平的“最终解决”，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或最高决策者（尤其是中国方面的）应当改变过去数年在彼此间交往中常有的几种外交国务做法，即少索取少给予、少索取不给予、甚或（在美国方面较多见）多索取不给予，改而尽可能排除国内外多种干扰，积极尝试践

行战略性的多索取多给予（Big gives and big takes），那是历史上强国之间要达成颇长历史时期内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就多半要采取的。

这样的战略性尝试当然有其限度，即不仅不倾覆本国的真正的核心利益为限，并且获得国内各主要力量的大致允许或基本支持，连同国外相关的紧要盟国或友国的起码接受或“首肯”，以防国内外的往往强有力的制约性力量消极抵制或积极损坏两大强国的有关磋商和安排尝试。还必须指出，这“最终解决”少有可能是某种战略性的一蹴而就的结果，但也不可能通过完全累积性的许多零碎安排去实现。

最后，某种意义上也最重要，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或者说以不急剧冲击或突破对方紧要利益底线的、伸缩不定但以伸为主的“逐渐进逼”）步步迫使和劝使美国退让，从而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上面所说的和平的“最终解决”。然而，对这一战略能否成功来说，不确定的要素依然是我刚才指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两难，此外还有最高领导层本身的战略才干和战略耐久性，连同（这是最重要的之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未来十年甚或几十年的可持续的强劲发展。如果这一条实现了，诸位等着，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美国会对中国退让。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中美大国关系。

刚才我所指的是指中美关系的好前景。对中国来说的好前景，也是对美国来说的好前景。同时也必须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不祥的或甚为危险的前景。

因为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特别是，中国经久持续的急速的军力建设（尤其是经海洋、空中甚而外层空间的战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设）正在愈益成为美国的战略精英甚而颇大部分美国公众的显要忧惧。另一方面，美国的地缘战略“再平衡”，加上因为减抑人员伤亡、减少军

事开支和应对更大“威胁”的强制性必需而力度加剧的“军事革命”（诸如“海空一体战”之类），再加上美国经非常积极和灵巧的努力在中国周边的外交竞争得益和地缘政治添乱，已经使中国远更不满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更加决心加速推进自身的军力建设和军事反制努力，并且新近以来考虑在东亚对美国的某些战略盟友或伙伴作武装较量。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将它视作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最重要战略资产，同时反复证明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而战争。反之，中国近 20 年来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发展权利和呼应国内要求，始终决心军事现代化和拥有战胜能力。中美之间的这一最根本矛盾当然并非没有可能破坏未来的中美关系。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阻绝这一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能够进行“底线思维”的要求，中国要有应对这可能性不幸转变为现实的心理准备甚或战略准备。这就是另外一种可能的中美关系前景，就像地平线远处聚集的乌云。

最后我要讲讲现在的情况。不是争取“中美大国新型关系”吗？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在加州进行了高峰会谈，这就是我们面前初始的现实。对习—奥加州峰会，全世界有很多评论。我这里是一堆个人评论。有一种个人评价，深刻地反映了在当今中美基本关系中的国际和国内政治。个人评价是在习—奥加州峰会刚结束不久，大概一两天以后，我和香港某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东亚国际关系专家在 2013 年 6 月 11 日的电子邮件交流。香港的这位大学教授写道：“习奥加州峰会再度证明，中美战略关系由彼此间的战略竞争界定。美国坚定地拒绝中国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敦促，因为它表明北京追求平等。许多人一直将 互信问题错误地界定为对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然而，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是权势分享。”他接着写道：“中国国内对这次峰会的编撰正在成为愚

蠢的……媒体示意中国与美国都已同意去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现实是美国方面……从未真正地提到它。”他还写道，“更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实际上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安全问题上，例如在中日两国（就钓鱼岛）的争端、南海争端和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某些中国对外政策机构的自欺欺人简直令人震惊。”

我的回复是：“这里的政治文化已在这么一个程度上蜕化，以致确实意外，甚至对冷峻的‘现实主义’来说也是如此……大致是国内需要所致，加上你透彻地指出的‘某些中国对外政策机构的自欺欺人’。中国内外没有任何人提到，奥巴马绝对不肯对习近平反复申明的一个论点或主张给予任何理睬，即‘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那在奥巴马的耳朵里意味着美国应当（或可以？）大致自愿地给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非同小可的追加‘战略空间’。事实上，这两位元首在战略方面互不喜欢对方。……”

非常非常感谢，我期望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能够会有一个认真的、很好的提问、讨论和答复。

鈴木：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では、まず、みなさんの方から何か今の時殷弘先生の基調報告に関して、質問ないしは事実関係で確認したいところなどございましたら、どうぞお手をお上げ頂きお尋ねください。

参加者：今の中国外交政策の動機は二つある、一つは国内的な制約、もう一つは国外からの刺激、この二つ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が。ご説明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ことのように伺いました。国内的な制約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すか、さらに詳しく説明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鈴木: いくつか纏めて伺っておくことにいたします。他になにかご質問はございますか？

川村範行: 時殷弘先生の大変幅広い国際関係に対する考えを披瀝し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私は日中関係学会の副会長及び日中関係研究、それから中国研究の立場から、後の時殷弘先生と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その前に、今の時殷弘先生の報告の中で、ちょっと私が理解不十分なところがありましたので、確認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習近平さんが述べた言葉の中に、“着眼大局、管控风险、经略周边”のすぐ後のところですけども、習近平さんがおっしゃった言葉ですが、中国語で言うと“底线思维”と“近底线操作”ですね、この意味をもう少し詳しく説明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

それから、合わせてそのすぐ後の“战区作战方式”という表現が出ましたが、これについても、こ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をもう少し付け加えて説明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存じます。

時: 非常感谢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今天主要谈的是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对外前景和中美关系前景。我没有详细地讲中国的国内制约。但是国内制约非常明显。

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庞大的体系，社会变化非常急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里面比方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利益、他的倾向，总的来说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在增强。又比如说中国现在面对的东海、南海问题，其中有最近几年力量影响发展非常快的海洋管理部门，那也很了不起嘛。

那么中央政府内部还有，对外经济部门。比如说和美国的关系，中国银行很重要啊。财政部很重要啊。财政部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跟外

交部一样的。还有地方政府，比方说，海南省政府，广西省政府，广东省政府对于在南海建立三沙特别行政区军分区非常开心。又比如说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为什么这几年搞得不太好。有一个重要原因，缅甸人越来越不满，说很多中缅关系是通过云南省政府操作的。他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是一个省政府。

还有公众舆论，中国 13 亿人口，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再加上新的技术手段，网络等等，这 13 亿人几乎在所有各种重大的国内问题和对外问题上都有相当严重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分歧。但是有一条，说要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公众是压倒性的非常非常拥护。

还有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报纸的数量，杂志的数量，电视台的数量，可以说远远超过日本。其中严格来说没几家是共产党的官方媒体。官方媒体，半官方媒体。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国内问题上批判所谓宪政思想的很多文章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的，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就证明我们几个《人民日报》。《环球时报》非常有名，这个不是官方媒体，它挂在《人民日报》底下，是半官方媒体。还有非官方媒体，你到中国去看一看中国的媒体数量，比日本不知道要多多少。他们有各种意见，但是有一条，民族主义能有利于卖报纸、卖杂志。这跟日本是一样的。

还有巨型国有公司啊。中国中石油、中国银行，他们没有利益吗？中国中石油东海打气井，当然这是中央命令的，但是恐怕中石油又很有钱也很起劲嘛。我这个话就表明中国对外政策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中国各种各样的国内力量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正在变得越来越显著。

第二个问题叫“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这个词来自习近平。什么时候说的呢？十八大开过以后，他当了总书记不久，在内部会议上说的。说的时候的语境是什么呢？语境就是在谈跟日本的关系，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对抗时说要“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

就是想到最坏的地方。比如说，要想到可能接近军事冲突。但是“底线思维”有一条，不要突破底线。这个操作其实英文里面有个词，就是“边缘政策”。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但是风险也很大。碰到底线就要打仗，甚至要打大仗。又要不碰到底线，又要接近底线，如果成功执行的话，对方就会退。当然这就要求非常高明的战略操作。这叫“底线思维”，思维是脑筋在动。但是不光是在这样想问题，还要做的。那么这个“做”，就是接近底线的操作，现实就是接近但不碰到底线，不打仗，但是叫你退。不光是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有长远来讲美国在西太平洋上。当然操作有几个问题不确定，你能不能真有那么高明的战略操作，还有特别是国内的制约，国内的各种力量可能叫你不要管风险，所以习近平讲要“管控风险”，但同时是“近底线操作”。

还是在钓鱼岛甚至是西太平洋，这个不是习近平讲的大局。是大局里的一部分。就像军队打仗一样，你打一场战争，有战争目的，这个是最高的政治目的。在这个里面，你要作战，不是打小的战役。战区，比方说1944年诺曼底登陆以后，艾森豪威尔当总司令的欧洲战区，这个里面怎么打胜仗，怎么来避免败仗，怎么来叫敌方退让，但这个不是战争本身。战争本身就相当于中国的大局。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你又想打赢这个战区的仗，但是可能这个仗打赢对你的战争目的是有点坏处的。那么你要说服你的军人，要说服你的战士，要说服等等国内力量，说能不能不这样干。可是国内力量又很激动。所以中国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大局，大局对外关系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要使得美国承认中国是世界强国。这就是中国的大局。

鈴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ちょうど時間が来ましたので、15分ほどお休みをして、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移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で

は3時25分から再開しますので、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休憩)

加々美：では再開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のセッションでは私、加々美が進行役を担います。

時殷弘さんとは、僕は2003年彼が「対日新思考」というのを馮昭奎さんと馬立誠さんの三人で提起して、大きな話題を呼んで以来のおつきあ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が、まず、馬立誠さんは朝日とかいろいろところが日本へ招聘して、新聞一面を賑わせたのですけれども、時さんのほうはしばらく日本にいらっしや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が、僕が2003年に彼と知り合ってから、ICCSではその後何回かシンポジウムにお呼びしているので、付き合いは10年に及んでいます。

昨日は午前10時から午後まで四時間半徹底議論をしたのです。今日のところは皆さんに一方向的に時さんから基調報告を行うというかたちではありますが、僕と彼との間では、いくつかはぶつかりました。

今日の講演は基本的に中国の対外政策と特に中米関係を軸とした話です。国内問題についてはおそらくほとんど触れ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の場合もそうですが、どこの国でもそうですが、国内の問題と外交の問題は、連動しています。そういう連動性から出てくる、彼は「一番下の線」という、簡単に言えば「これ以上は譲れない」という外交の面において、最低ラインの話をしました。

内政でも同じように「これ以上は譲れない」ライン、もし許してしまえば、決定的な国家的な危機を引き起こす問題があるわけです。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今日は名古屋外国語大学の川村先生と鈴木規夫先生と僕と、それと時さんを交えて、できるだけ討論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最初に川村さんから、時さんの講演

を聞いてどういう感想を持ったか、またご自分の意見を含めてお話しください。

川村：時先生のお話を聞いて、私は特に日中関係それから米中関係との兼ね合いで、いくつかのポイントとなる点について意見交換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第一に、中国の対外政策のこの流れの中で、習近平の外交をどう捕らえるかという点です。これは中国の対外政策というものは、ずっと一連の基本政策の上に立って置かれて来たというふうに私は理解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今日の時殷弘先生の報告内容によりますと、「習近平外交」というものはその直前の「胡錦濤外交」と異なる面があるという点が出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それは、一つは対外的に非常に強い姿勢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が、具体的に特に軍事力というものを全面的に強化、それに戦争への備えというものを強調しています。これは胡錦濤の時はあまり露骨的に表現しなかったですね。胡錦濤は政権をとって、僅か一年以内でそれほど露骨というほど戦争への準備とかをやって、軍事力の強化というのは出てこなかったですね。これは一体習近平政権にとって、特に軍事力への強化、そして戦争への準備というものを強調する理由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でしょうか？ 時先生の報告では主に外部からの刺激という要素をあげておりますが、それは単に外部からの刺激によるものですか？

それから中国の対外政策を見ますと、鄧小平時代からずっと受け継がれてきた外交方針がありますね。所謂姿勢を低くして、謙虚に事にあたるという“韬光養晦、有所作为”がありました。胡錦濤の後半特に2007年以後、若干の変化がありました。この鄧小平のローガンに二文字ずつを加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ね。一つは“坚持韬光养晦”、もう一つは“积极有所作为”というものです。特に後半の“積

極的に”が出て、特に対外的に積極的に中国の振る舞いが顕著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私が捉えております。

これは特に国際政治経済において、また対外的な安全保障の面でもそのような傾向が出てきたと思われま。となれば、習近平政権の強硬姿勢は胡錦濤政権の方針の延長線上にあるのですか、それとももう一つの点から、がらりと変化したのですか。つまり鄧小平のローガンから胡錦濤の新しいローガンへと、そしてまたもう一つ習近平の新しい方針というものが出たと見るべきでしょうか？ この辺は先ず一つ大いに関心のあるところです。そしてこの強硬姿勢の反映として、例えば尖閣問題、それから南沙で中国の非常に強気の姿勢が出ている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もう一つの疑問点は、この尖閣の問題について時殷弘先生は真の狙いはアメリカに認めさせることだと、アメリカに中国の対外的な力を認めさせることであって、尖閣諸島そのものの問題ではないと言いました。この点は日中関係を研究している者としてはもうすこし説明を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ね。それはやはり大国化した中国が「海洋強国」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とを習近平政権が掲げている中で、安全保障上においてやはり尖閣諸島を中国の自由な範囲にしたいという狙いは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日本の専門家が見ている。そういう中国自身の安全保障上の狙いということと、アメリカに中国の実力を認めてさせたいということと、どのような整合性があるのでしょうか。

加々美：大きく二点の問題がありました。一つは胡錦濤の時代から習近平の時代に移ってくる中で、強硬姿勢が目立つけれども、その具体的な変化はどこにあるのか。これが一点です。

二点目はアメリカを意識しての対外政策で、尖閣問題が実は最も主要な戦略にはっていない。一番の目的はやはりアメリカにあるという見方。この二点についてもう少しお話を伺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習近平が強硬姿勢に変わったというその本質はどこにあるか、それとアメリカに認めさせたいという中国の外交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もう少し具体的にどう論証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日本人は学者を含めこの点をほとんど見ていません。尖閣問題は日本と中国の関係であって、それでは中国が見ているのは日本ではなくアメリカだと言い得る根拠はどこに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鈴木：時殷弘さんが非常に大きな視点から問題提起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ので、私もそういう観点からおもに三点の問題を提起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一つは軍事力の問題です。時殷弘先生は中国国内における軍事拡張をお話になりましたが、アメリカも実は同じことが言えると思います。客観的に見て、アメリカの破壊能力に対抗する軍事力を中国が保有してもあまり意味がない環境があることは事実でしょう。しかし、中国人民解放軍はそれをそのようなものと思込むことが可能かもしれない。先ほど習近平さんがオバマさんに「太平洋は大国二つが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語ったという話は、それより前に中国人民海軍のトップがハワイのアメリカの司令官に向かって似たような話をしたことがあるわけです。アメリカの軍事力から判断すると、中国の軍事力は無視できませんが、レベルは異なる段階にあると考えている側面が高いので、中国にとっても米中戦争に耐えられるような準備をしても中国の利益に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アメリカのリベラルな論者も喜ばないと思いますが、誰が喜ぶのかというと、多国籍軍

事産業が喜ぶだけであって、また中国の軍事拡張によって、アメリカの軍事予算の削減を阻止するために、政治的な操作の口実に使われます。軍事バランスを米中関係の中でどう求めるのかということ、客観的な指標をもう少しシビアに持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二つ目は、時殷弘先生は「二大国化」ということをお話されましたが、米ソが対立していた冷戦構造が示していたように、現在のアメリカと対抗するための大国——中国という問題の設定は誰にとって都合が良いかということ、衰退しつつある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は、中国とアメリカとの二大国を言うことによって、アメリカの大国の位置を維持させることにおいてはすごく有益ですが、中国にとって、今アメリカと並んで「二大国化」することにはあまり意味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ということです。

むしろ、中国はアメリカの一部の勢力が考えているように、世界の多極構造の中で、リーダーシップが取れるような世界秩序の再編に向かうことで、いろいろなことを考えたほう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のです。つまり、「二大国」は中国にとって一種の幻想に陥る罠で、その「二大国」構造は結果的に何を近未来にもたらすのかということ、アメリカの衰退を遅らせ大国アメリカを維持させることにしか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したがって、対中国強硬派の人たちは、アメリカの世紀はまだ続くということで、盛んに議論を進めています。その「二大国」論理は中国のためというより、アメリカの延命のために使われている方が多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のです。その点について、中国の指導者や、中国の世論は、どのような視座で考え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もう一度率直に意見交換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

三つ目は、一番と二番の論点に共通していますが、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問題です。中国は現在の状況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くために、どういう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能力をも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もちろん、ここで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というのは、ただ単に情報を意味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情報を認識し、政策決定にどのように生かすかという知識、情報の政策決定プロセスと情報収集能力の問題であります。こ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問題をどう考え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アメリカ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CIAなど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ある程度オープンで、どういう水準であるかは分かります。またかつても今もいろいろなところ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能力の発揮される所謂スパイ組織がありますが、21世紀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状態というのは、ただ単に敵、見方に分かれて、情報戦を展開するばかりでなく、世論をどのように誘導するかどうか、ネットワークをどのように築くかかどうかというような問題で展開していて、ちょっと複雑になっています。中国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今どのような状況にあ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こがとても気になっています。

というのは中国国内の個人、あるいは政治的対立者に対して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すごく高度に発展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が、対外交渉の場面におけ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一体どうなのでしょう。例えば、人民解放軍の新しい昇進リストが、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が知るより以前に、アメリカの国防省の方で流通し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といわれ、「チャイアメリカ」という言い方で表現される一種の軍事共同体のような存在が取沙汰され、かつての米ソ軍事組織間の関係のように、そこから国家間関係の曖昧な状況での情報流通があったりするという事も考えられます。その時に、アメリカの場合には、まがりなりにもリベラ

ルデモクラシーというイデオロギー的な基礎が辛うじて存在していますが、中国の場合そ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能力を活性化させる際に、どんなイデオロギーを、あるいはどんな規範を軸に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もう労働者の世界連帯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は簡単にいかない、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イズム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わけです。この辺りをどのように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以上三点を時殷弘先生と議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加々美：鈴木さんがこの二日間、煮詰めて煮詰めて出して疑問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分かりやすい疑問でした。とりあえず二人の疑問と観点について、ちょっと時さんの考え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

時：非常感谢众位提出非常好的评论和问题。我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侧重回答几个重要问题。

在对外政策基本方向上，基本状况上，确实习近平和胡锦涛不同。但是我要强调没有那么大不同。胡锦涛执政十年，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执政八个月。胡锦涛的十年里面，对外政策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用胡锦涛的后五年，来和习近平的这八个月的对外政策重心内容相比，可以发现，主要是延续性，而不是根本不同。胡锦涛后五年，中国对外政策，以对美关系为重心，重中之重的重。结果对美关系没有搞好。胡锦涛后五年，由于客观上原因和主观上原因，中国周边外交总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习近平是八个月，恐怕对美关系还是一个重中之重，同时这八个月，尽管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困难情况下改善中国周边关系外交，但是困难很多，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做。胡锦涛是强硬对待2010年钓鱼岛危机的统帅，也是从2012年9月开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中日钓鱼岛对抗的统帅。习近平的对日政策，

目前还是一个继续，所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有不同。什么不同呢？不同在于不同的侧重。现在我们可以对胡锦涛的外交政策做定评，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不要过早的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做出判断，因为他还有9年4个月的时间。但是就这样比较，可能习近平在对外政策中对美的关系上的重视程度、对日的强硬程度、对发展中国军事力量的侧重程度更高。

同时，这两个人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胡和习的战略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还有，胡锦涛在最后的五年，在对外政策上，似乎面临中国国内的很大的推压。公众舆论、解放军等等、等等。习近平现在同样，但是习近平似乎更主动地去回应这些压力，把这些政治压力变成他的政治资产。“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打仗，打胜仗”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胡和习对待国内的这些压力是不一样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千万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刚才讲的不同，不是根本不同，但仍然是非同小可的不同。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钓鱼岛。钓鱼岛问题的来源是什么？钓鱼岛问题早就存在，因为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申诉早就存在。但钓鱼岛危机来得很晚啊。我们只有2010年9月、10月是钓鱼岛危机。钓鱼岛问题存在了几十年，但是钓鱼岛第一次危机到现在三年还不到。第二次危机，去年9月10号开始。钓鱼岛危机怎么来的？太清楚了，不是中国人搞的。2010年，中国一个渔船的船长被抓了。小泉前首相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问题。但那个时候小泉首相是外交解决，不是法律解决。所以中日没有经历危机。2010年的时候，民主党外相前原诚司发明了一个新东西，颠覆了中日关系40年来一大政治基础。这就是关于钓鱼岛中日两国政府事实上搁置主权争议。前原诚司前外相公开地说，钓鱼岛没有主权争议，钓鱼岛的问题完全按照日本国内法解决。这时候2012年以胡锦涛为首

的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硬的、危机性的反应。去年9月份那个“国有化”，“国有化”也不是中国人搞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场到现在为止已经一年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的原因。

那么钓鱼岛危机对中日两国来说有什么意义。除了钓鱼岛本身，还有钓鱼岛涉及到的重要海域——东海。两国在东海都有重大的战略期望和利益期望。但是钓鱼岛还是一件东西。就像过去小泉首相的时候，中日关系非常不好。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那是一个较量意志。如果日本在钓鱼岛这个较量中输了，恐怕以后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假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输了，也不一样了。还有，钓鱼岛问题发生以后，你看现在中国一些人士开始谈论冲绳不是日本的，开始谈论中国要大大发展远洋海军，开始谈论我们要冲破第一岛链。而且钓鱼岛这个危机9月10号以来，到现在一年还不到，中国的不单是海军，海洋力量急剧增长。

还有，钓鱼岛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到现在为止得到了什么？我坦率地讲，第一中国永远结束了日本单独对钓鱼岛实施行政控制的局面。那个局面已经维持了60年，中国一直没有碰过。但是“国有化”以后，日本对钓鱼岛的100%的实效控制局面，永远结束。第二，中国为什么要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么做，实际上是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在质疑、动摇美国的对日承诺。质疑和动摇美国原先的在东北亚的战略存在。第三，钓鱼岛，今后可能还会有别的情况。但至少以后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这是中国坚定的且并不触碰美国底线的一部分。最后，过去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很大程度是因为陈水扁、李登辉这些人想搞台独。现在两岸关系很好。如果钓鱼岛危机长期存在，中国有的是钱，中国人民别的问题意见很大，分歧很大。但是说发展国防力量，发展远洋海军，98%的中国公众是支持的。

当然如果在北京，我就会着重谈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风险、代价。但是我在日本，不准备多谈。

铃木教授，我非常感谢你的发言，但是有两点我不是很同意。你的意思是好像中国的20年的军事大发展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领导也不很笨，20年就做一件事情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这个是可疑的。首先，我刚才讲了，中国公众有很多内部矛盾、吵架、分歧。但是在发展军事实力上，绝大部分公众都是支持的。中国国内军事力量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利益的。第二，如果这里有中国地图，你来看看。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美国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战略空间。美国重来不承认、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战略大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如果出现情况，中国的舰队都通不过台湾海峡的中线，都过不了冲绳以西。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大国啊。所以中国13亿人下了一个决心，是江泽民时候开始下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经济搞好了，我们还有加强军事力量。所以长远来说，总的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在我演讲里面也说了，世界上的事都有双重效应，它大大增加了我们外交上的难题，大大强化了外国对我们保证和平发展的怀疑，大大加强了一些国内势力对中国国家战略的干扰。成本也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两难今后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最后，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当然总的来说不是在一个等级之上。我们充分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我们差得远呢，但是中国不想变成一个全球军事强国，但是在我们的家门口，中国早就下了决心，在西太平洋的西部，中国决心成为要比美国还强的国家。现在美国人已经怕了，中国东风41很有名，我称它为中国的常规战略武器。如果万不得已，要跟美国打仗的话，是可以击沉美国航空母舰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考虑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往后退，退到中国这些导弹打不到的地方。只要中国不混了头，不在不成熟的时候去跟美国较量，美国就要往后退的。也许将来美国对日本承诺的安全的可靠性就会发生变化。当然风险很大，中国国内能不能坚定的、但是审慎的不碰到美

国的底线，而坚持“近底线操作”五年、十年、十五年。如果能做到，我相信在西太平洋西部，中国一定会在军事上比美国还强。否则中国就永远不是一个世界强国。

我最后还要补充一句，成为西太平洋西部、也就是我们中国家门口的军事强国，这个中国一定会做到，很容易。中国有的是人、中国有的是钱，中国老百姓拥护这个东西。我们的主要难题和主要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成为军事强国的同时，我们在亚洲成为朋友多的，受欢迎的威望高的国家。这是我们长远的挑战。如果我们光有西太平洋的边际优势，而没有我们曾经有过的外交上的威望和朋友多的局面，我们仍然成不了真正的世界强国。

加々美：最後のポイントは実は僕と時殷弘さんと昨日四時間半の議論をした焦点なのです。周辺に友人を沢山持つということは軍事力を増強し、経済力などの物理的な、そういう意味の大国化だけではない、もう一つ良く知られている言葉でいうと、ソフトパワーですね。ハードパワーの面では中国はどんどん大国化しています。だけど今最後に話した友人を多く持つということは単に軍事、経済の大国化だけでは持てないですね。そのポイントはどうすればソフトパワーを大きくしていけ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とは十分議論されていないようです。

ただ若干補足していきます。前原さんが外務大臣だった2010年10月に、それが暴れたことによって結局は尖閣の根本的な問題として、ここまで悪化させた最初のステップでした。前原さんは領土主権の問題は根本的に存在しない、それについて議論する必要がないとしています。これが彼のいう「前原ドクトリン」ですね。そして「前原ドクトリン」にはもう一つ重要なポイントがあり、「棚上げ論」は中国一方的に提起したものであって、日本はこれに関知していないとしています。

田中角栄前首相の時も、また日中友好平和条約を締結した時も、周恩来の「棚上げ論」、鄧小平の「棚上げ論」であって、この二つはどちらも周恩来や鄧小平が勝手に言ったもので、日本は関知してい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すね。これは前原さんが国会の答弁で発言したもので、その直後に外務省のホームページにドガンと載ったのです。今でも外務省のホームページを開いて、まったく同じことが主張されています。

これを中国の中ではいち早く指摘していました。つまり野田さんの「国有化」の問題よりも、そっちのほうがもっとも問題だということを一早く指摘したのは時殷弘さんです。だけど、今は「棚上げ論」について、僕はそれを肯定するような記事を「朝日」とかに書きたいだけでも、書かせてくれません。勿論テレビもそうです。本当に言論の自由がある日本で、そういうことを書け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極親しい人だけに回している新聞なら書けますが、でも何十万部も出ている新聞、メディアなら絶対に書けません。事実僕が試みて失敗しています。

野中広務が今年の6月初め、中国に行って、田中角栄さんは「棚上げ論」に同意していたのだと劉雲山という政治局常務委員にはっきり言いました。そういう所に一番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先ほど鈴木さんは「二極構造」問題、あるいは軍事的にアメリカと対抗しようとしても意味がないではないか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ついて時殷弘さんはあっさり否定しましたが、実際はこの点は戦争までやろうというそこまでの対抗力を持つとはしていない。つまり、これは時殷弘さんとの討論でお互いに分かってきたことです。戦略的にこれを利用するのは、アメリカというファクターが中国の国内にとっても、外交政策においても、根本的に戦争の相手にしていくことはないです。だ

けど、そのように見せることで、これは大きな利益があるという議論です。

僕の意見では、国内の内政と外交はどの国でも連動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だから日本もそうですよね、日本は今どんどん経済的悪くなって、スーパー経済大国だった日本が今中国にもどんどん見る影もなく追い越されていく、その時に中国ファクターが重要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す。国家的にもそうです。だから民衆の世論もそれで動か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の点で、僕は尖閣問題の解決にとっては、民族主義の点が決定的に大き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こは時殷弘さんの意見と僕の意見が相当ぶつかったのですね。

日本の民族主義も中国の民族主義も不思議のことですが、1980年から90年代に入るまで、どちらも信念危機、あるいは思想の危機に落ち、思想そのものが決定的に衰退するという状況がありました。15年くらい続いて、それから一気に日本で言えば、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それから自由主義史観という、民族主義が一気に台頭しました。日本は決してだめな国ではない、悪いことばかりしてきたではない、もっと誇りを持つべきだという新たな民族主義が台頭しました。まったく同じようですよ、中国も80年代から90年代半ばまで、そういう政治信仰的な危機があったわけです。ところが、それが90年代の半ばになって、一気に自分の民族を誇りに思う、もっとプライドを持つべきだという民族主義が起きてきて、中国は更に2002年から2003年にかけて明らかに平和的な大国としての台頭という言葉が中国で言われます。これはちょうど江沢民政権が胡錦濤政権へバトンタッチした時期です。これが90年代半ばころから起きた新た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と重ねてくるのです。

時殷弘さんと僕と完全に意見が一致しているのは、軍事力の強化については、まったく

民衆に異存はな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中で、中国は今色々な矛盾にぶつかっていますね。一年で20万件民衆紛争が起きている、それだけ矛盾を抱えているけれども、軍事力強化という皆が賛成するんですね。

僕たちは尖閣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何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の間の世論調査で、日中両国どちらも90%以上の方が相手の国の人に対していい感じ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データが出ました。この点をほっといて、尖閣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昨日時殷弘さんと僕とが話して、時さんは民衆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対して、民衆が教訓を学ばないかぎり、意図的に世論を変えることは簡単ではないと主張し、ですからもうちょっと現実性をもって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思うべきであって、僕の考え事はある程度理想主義だと話した。僕の兄貴だってそうです、中国の話しを聞くと、何であなたは中国の研究をしているのだと、どこかで認めてくれないですね。自分の兄貴を変えることすらできないのに、日本の国民のそうした方向を変えることがどうして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はその通りですね。

もう一つ簡単に言えば、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問題は勿論中国にとっては内政と外交が連動していますから、年に20万件の民衆事件をきちんと把握していなと、これは共産党にとって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だから、僕は民衆的要素、民衆というファクターをもっとなんらかの形で議論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前原ドクトリン」は一種の愚民化政策です。確かに内政と外交が連動していくゆえに愚民化政策がよく使われてきたという面があるわけです。この意見を聞いて、時さんはあまり賛同しなかったです。川村さん、鈴木さん何か補足するところありますか？

川村：たぶんフロアの方も聞きたいところですが、この尖閣をめぐる、日中関係は打開されるのか、あるいはどう打開されるのか、そして日中間にこの現場周辺の衝突が起きる可能性があるかどうか。尖閣問題の発端は2010年9月の漁船衝突事件にあって、それから昨年「国有化」決定というように繋がってくるのですけれども、昨年の9月以後、日本と中国ではどのような関係改善の動きがあ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という点ですけれども、私は二つの段階があると見ています。

第一段階は一月の下旬公明党の代表の公式な訪中団が習近平総書記と会見をしたという点です。この時安倍首相の親書を出されました。公明党の山口那津男代表が親書外交という形で中国の当局にあったですね。尖閣諸島「国有」問題が発生して以来、習近平さんが日本のしっかりしている人と会ったこの時は、もう後にも先にもないですね。この時は一つ関係改善の兆候が見られたです。実際はその時習近平総書記は尖閣の問題について、話し合いと協議によって対応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明言しました。しかし、その直後に、アメリカの海軍による日本へのレーザー照射事件というもの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また険悪になったわけです。

その後第二段階はこの6月のオバマ、習近平の首脳会談をきっかけに、オバマ大統領から習近平国家総書記に対して、この尖閣諸島の問題でトラブルを起こさないように、力ではなく外交で解決できるように注文をつけました。また、同様にその直後、安倍首相とオバマ大統領の電話会談によって、これは僅か30分でしたが、内容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ませんけれども、やはりオバマ大統領から安倍首相に尖閣問題について、中国と話し合いで解決するよという注文が付いたと、私は聞いております。

これをきっかけに、日本側は谷内正太郎元外務次官を中国へ派遣し、またその後は、今は政府の参与になった、元は小泉首相の秘書官飯島勲を派遣し、そして7月の末には現在の外務事務次官を派遣しました。日本政府はこのような外交的な動きを見せたわけです。残念ながら、首脳会談へ向けての動きが見られない。それどころか、中国側はこの安倍首相の対中外交に対して、非常に懐疑的、疑問を持った態度を見せ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安倍首相は口先では「会話の窓口が開いている」と言いながら、実際は中国けん制の外交を進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また習近平政権もオバマ大統領と首相会談の後、改善のために大きな動きは見せていない、それどころか、外務次官が訪中している最中に、習近平氏は北京の軍区を訪問して、ここ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べきだ、そして戦争に必ず勝つ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に檄を飛ばしていました。習近平政権としては、軍備の拡張、増強に力を入れています。それからもう一つ、8月の今月の初め、中央政治局会議において、「建設海洋強国」の集中研究会をやって、「海洋強国」を推進すべきだと言いました。中国の主権を犠牲にすることは絶対にできないだという発言をしています。これに対して、安倍政権も一方で外交での事務的レベルの接触を続けながら、一方では非常に防衛力の強化を図っています。例えば、アメリカ軍と自衛隊が一体となって、島を奪還する共同の軍事作戦を行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また7月に発表された国防白書では中国を脅威と捉えて、また自衛隊の南西地域における強化というものを行っているですね。このように、安倍政権も習近平政権もオバマ大統領から尖閣諸島の外交的解決を求めながらも、実際は非常に軍事力の強化というものを強調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となれば、尖閣諸

島の問題はいつどのようにして打開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

時殷弘先生のお話だと、今の習近平政権の対外方針としては、力で押して、押して、相手をぎりぎりのところまで押し込む、それによって相手をしり除かせるという姿勢な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を続けた場合に、日本はどう出るでしょう。これについて時先生はどう見ているでしょう。これは加々美先生のご主張に関連するわけですがけれども、今日本の国内において、中国に対する印象が非常に悪くなっている。極めて悪化している。中国に対して好意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うとう 90%に達したわけです。これは調査史上最悪の状態です。このような日本国内の雰囲気为背景にして、安倍政権も中国に対して非常に強硬な態度を採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より、採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によって、国内の状況と政権の政策を連動しているのです。ということで、安倍政権もなかなか尖閣問題で中国に妥協はできない。つまり中国が非常に強硬な姿勢で日本の尖閣の実効支配を崩し、そして中国も実際に尖閣を実効支配しているという既成事実を作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がけれども、日本は国内世論上から、中国に押されてしり除くということとはできません。となると、日中間のこの問題の出口はどこにあるのでしょうか？解決の道はあるのでしょうか？

時：我说的很简单啊，今天非常坦率地讨论。钓鱼岛问题如何解决，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在我们能够预见的未来，绝对不能解决也不会解决。将来总是要解决的，但是这个超出了我们的预见。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9月11号声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是很客气的。就是说只有一个要求，日本必须承认钓鱼岛有主权争端，在这个意义上，收回国有化。假如野田内阁当时有所反应，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中

国是很讨厌前原诚司，但是中国更讨厌野田。为什么？因为9月9号中国国家元首在中日关系很糟糕的情况下，最后同意会见日本首相，在走廊里面谈了20分钟。劝他，要等一等，不要轻举妄动。结果野田首相几个小时以后赶回东京，连夜召开内阁会议。中国主席怒不可遏啊。这是真的。我想这个野田做错了。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9月11号声明发表以后，假如日本内阁9月15号或者10月11号说，好像是有一点主权争端。那么中国即使已经发动了结束日本几十年来对钓鱼岛的实效统治，中国也会停下来。但是没有。所以中国的立场就有变化了。

第一，中国仍然坚持，钓鱼岛是中国主权；而日本坚持钓鱼岛是日本主权。所以有主权争端。第二，永远结束日本几十年的对钓鱼岛的100%的行政控制，永远结束中日两国政府先前在东海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和没有达成的协议。

到今天，日本还没有对中国做出丝毫让步。中国也不期望光通过外交劝说来说服日本承认钓鱼岛有主权争端。即便日本首相将来想承认有主权争端，他也不想承认。因为假如日本首相将来承认：“对，非常可惜钓鱼岛有主权争端”，他马上会叫中国马上退回到9月10号以前，请你们恢复日本几十年的对钓鱼岛的完全实效统治。中国国家主席的答复一定是“不”。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双方的任务是控制对抗，因为全世界都认为有发展成为中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的作用是什么？自从1月19号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声明到美国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所有的美国的立场就是，第一美国永远不会说主权归哪个；第二，美国仍然维护说美国反对单方面损害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但是哪怕是美国总统，这个不能说服中国人。因为如果中国的习近平说“yes”，那有一个比美国总统厉害的多的人是不同意的，这就是中国公众。所以美国现在主要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双方施加影

响，帮助控制钓鱼岛对抗，不要让它发展成为军事冲突。中日两国政府目前现实的任务，也在于此。

至于安倍首相说要会谈这个、要会谈那个，本来中国还抱点希望。钓鱼岛危机开始以后，前头两个月，中日之间高层的外交渠道是通的。公明党党首递交安倍首相的信，外交副官到北京，后来中国发觉，一点用都没有。骗人。因为日本顽固地不承认钓鱼岛有主权争端。而且安倍首相的外交是在干什么？包括他的最高会晤的建议，就是为了影响美国，影响世界舆论，影响亚洲国家，想表明我日本首相、日本政府是冷静的，是希望中国拒绝。中国再也不会犯胡锦涛过去曾经后悔的事情。胡锦涛曾经多次不顾国内的反对，跟小泉首相会晤，希望小泉首相再也不要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胡锦涛主席得到的结论，就是小泉完全不可靠。在习近平主席的心里面，对安倍首相绝对就是这个印象。安倍首相不可靠。中国人再也不会搞一个最高级会晤，结果中国老百姓问得到什么成果？说没有成果。中国老百姓现在不需要在其他层面上的成果，中国老百姓要钓鱼岛问题上的成果。日本不肯在钓鱼岛问题上给中国老百姓成果，中国政府就可以对中国老百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永远结束了日本单独控制钓鱼岛的局面”。所以，在目前状态下，没有可能解决，但任务非常重大。

中日两国如果打起来，这可不是好玩的。还有，中国人民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对日本的感觉非常不好。日本老百姓、人民对中国的感觉也很不好。非常遗憾。这样接下来，就是较量了。对抗啊，看谁能撑得久。我想中国大概能撑得久。非常遗憾、非常遗憾，40年来中日双方无数的人，从政治家到教授、到商人，为中日正常关系、甚至友好做出的工作全部被浪费了。很遗憾！

结果现在中国人民讨厌日本，日本人民讨厌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对抗，看谁能撑得久，我想中国可能撑得比较久。如果这个对抗结束，

我们永远是邻居，哪怕时间更长，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个世纪。邻居总是要做正常的好邻居。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正常的中日关系，中国难以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正常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安全没有保障。所以一定要有较好的中日关系。但是现在要耐心。要让双方的人民学点教训。

鈴木：時殷弘先生、前原議員はアメリカのどういう勢力と繋がっていると考えますか？そして尖閣諸島で日本と中国との間で軍事衝突が起こるといことは、基本的に相手は日本の自衛隊となりますが、日本の自衛隊は韓国軍と同じで軍事的にはアメリカの指揮命令系統に入っていますので、安保条約があろうとなかろうと、軍隊組織としては一体なのです。そのことと、アメリカと中国との直接衝突がないという時先生の先ほどの見解とどのような繋がりがあのでしょうか？

時：我讲一句啊。在中国凡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前原诚司，首先是民主党里最最亲美的；第二，他骄傲。他不尊重首相，也不尊重官房长官。他比小泉前首相还有骄傲。第三，前原诚司几次跑到华盛顿，请求希拉里前国务卿发表声明，就是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因为美国知道他是民主党里最最亲美的，所以美国国务卿应他的要求，几次都给了他想要的东西。

但实际上很清楚，日美安保条约毫无疑问美国官方立场就是涵盖钓鱼岛的。但是军事同盟条约，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美国会出动美国的武装力量，站在日本一边，就钓鱼岛问题跟中国作战呢？

- 第一， 中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 第二， 在这个大规模军事冲突中，日本扛不住了，可能被击败。
- 第三， 在美国看来，导致对抗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挑衅方是中国。

第四， 如果美国的军事干预能够取胜。

所有这些就表明，美国真要进行军事干预的话，恐怕华盛顿要下决心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中国来说，如果有人说要跟日本打仗，就要做一个准备，你敢不敢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领袖说我敢跟美国较量一下，那么就麻烦了。但是我想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当总书记以后说：“要管控风险”。什么叫“管控风险”？

但是有一条啊，中国领导人不能在这个较量中输的。如果迫不得已，是有一点武装较量的决心。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打了多少仗，中国不想打仗。但是中国包括习近平也不能容忍在钓鱼岛这个较量中中国输掉。

加々美：もう時間的にはそろそろですから、僕からは新しい観点は出さないようにします。僕と時殷弘さんの対談の際に、日中間に尖閣をめぐる、戦争が起きないといえるか、それとも今の状況のままでずっと推移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を議論した時に、時殷弘さんはいつ起こるかは分からないと、それは明日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ただし、問題を根本的に解決しようとするれば、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はかかるという見方はしておくべきだと話しました。中国が三十年後に変化していない、あるいは日本が三十年後に変化していないとは誰も言えないわけです。勿論、安倍政権は終わ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し、習近平政権も終わっているだろう。だから時殷弘さんは問題解決するには忍耐力が大切だ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は政治家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ます。どれだけ安倍首相が忍耐力を持つか、あるいは同じく習近平さんも忍耐力を持つか。実は中国は春秋前後から数えて三千年の歴史の中で、忍耐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が勝っていると、必ず最後の勝利を収めるというわけですね。例えば、一番有名なのは劉邦と項羽の戦いですね。劉邦は連戦連敗で、敗北を重ねて、最後に勝ったわけですね。だから、劉邦ほどの忍耐力のあ

った人はいないし、それではまた世界を変えます。それは現時点でも通じています。

ただいつ軍事衝突が起こるかは分からない、それは誰でも予見はできない。その代わりに、危険な状況が続くという状況を二十年我慢できますか？ 僕はたぶん二十年後に死んでいるからと時さんに言ったのですよ。僕が目を閉じるまでこの状況が続く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最後の結論として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ですが、僕はやはり今お互いの世論の90%を越えて、相手が嫌いだという状況をどう考えても好きではない、この現況を変え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時さんはこの点では悲観的です。

もう一つ言えば、日本は外交のフリーハンド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アメリカの言う通りに、アメリカに寄り添う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これは戦後アメリカの占領下にあってから、その後、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を経ても、尚且つ自主的な外交というものを持ち得ないわけです。けれども、時殷弘さんが言うには、隣の中国と友好的な関係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れば、アメリカ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て、外交のフリーハンドが得られると考えている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例えばドイツを見れば分かると思います、ドイツはアメリカと同盟関係がありながらも、外交のフリーハンドを持っている。それを使って、何回も戦争してきた隣国フランスと今、友好関係にあるからですね。日本が中国と友好関係を切り開けなくて、外交のフリーハンドをもつ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時さんは言うのです。これも確かにその通りかもしれない。

いくつか彼の論点を補足してみなさんに紹介しているのですが、僕と彼の違い、ぶつかり合いもついでに紹介いたしました。時間はもう来ましたので、フロアとの議論をと思ったのですが、実に申し訳ない、後で捕まえて議論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でこのセッションは

閉じたいと思います。長い時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